

自序

中國歷代盛世，號稱漢唐，其中唐代尤為鼎盛。也有人抬槓，說趙宋才是盛世呢。陳寅恪就說過中國文化至趙宋而極的話。但顧炎武比較了唐宋，卻說他所見唐代城址都宏大寬敞，宋代的城址就顯得基宇狹隘，唐宋的氣象，完全不同。其實，差別來自觀察角度的差異。

許多朝代都有自己的盛世。但是盛世的特點各有不同。有一種盛世，是因了統治者輕徭薄賦，以民為本，吏治清明，從而出現經濟發展，社會穩定的局面。另外一種類型的盛世乃是在治國理政的技巧之外，還有時代的因素、制度的因素，並且發揮着基礎性、主導型作用，從而顯出一種積極向上的氣象。所謂大唐氣象，就是這樣的盛世。

從公元一八九年董卓進京，到五八九年隋朝滅陳，中國的分裂長達四百年（其中僅有西晉短暫的統一）。分裂的原因，有社會問題（比如土地問題）、有民族問題（比如五胡亂華）。北朝波瀾壯闊的社會改革與民族融合，魏晉以來佛教文化的融入中華，無疑為唐朝大一統的博大氣派提供了底氣。這是發展的紅利。

漢末以來未能解決的土地問題，通過北朝中葉開始實行的均田制和租調制，得到了一定



三聯書店
Joint Publishing (H.K.)

程度的緩解，到唐代特別由於曲轅犁的推廣和普及，均田制的成就達到了高峰。唐代科舉制度，是漢代察舉征辟制度的升級版，也是魏晉盛行的九品中正制度的糾偏。宋代的科舉制度的細節是更完善了，但是，也變得更拘謹了。這是唐朝的制度紅利。

我們說大唐氣象，就是基於這樣的視角。

唐朝歷史將近三百年，七五五年的安史之亂，恰好是其中點。安史之亂的爆發，是制度紅利用盡與吏治腐敗疊加的結果。自八世紀中葉到十世紀中葉，中晚唐迄於五代這兩百年，是醞釀新制度、發萌新因素的時期，鼎盛之後走向危機，危機又為下一個盛世孕育重大契機，這是人類歷史發展的常態。

學習和研究唐朝歷史迄今四十年，主要研究領域是政治與制度史、家庭與佛教社會史。如何在給定的篇幅內，編選出一本反映自己主要研究興趣的集子，還是頗費躊躇的。原先列的篇目比較多，現在刪改成這個樣子。諸生管俊璋、吳姚函、周正、劉家璋幫助我完成了錄入和校對工作。

是為序。



三聯書店
Joint Publishing (H.K.)

張國剛 丁酉仲夏於北京清華園

唐代兵制的演變與中古社會的變遷

《新唐書》卷五〇《兵志》是「二十四史」中的開創之作。這不僅說明「兵」的問題在志的唐代和作者所處的宋代具有特別的重要性，也體現出歐陽修不凡的史識。但遺憾的是，歐陽修所修《兵志》，不重視「制」，而是着眼於「治」。所謂「若乃將卒、營陣、車旗、器械、征防、守衛，凡兵之事不可悉記。記其廢置、得失、終始、治亂、興滅之跡，以為後世戒」。說明他寫作《兵志》乃是從垂戒資治的考慮出發，其具體制度內容卻大多省略。

近代以來，中國學者研究唐代兵制主要關注於資料層面，而且受到《兵志》的影響很大。從晚清及民國初年連續對折衝府數目的考訂，到唐長孺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出版的《唐書兵志箋證》，^{〔一〕}都偏重於資料考證、整理與疏釋。陳寅恪、岑仲勉、谷霽光等的研究為《兵志》所局限，多集中於府兵制度。^{〔二〕}日本學者對唐代兵制的研究從一開始就走了另外一條思路，即努力探討府兵制之外的新兵制。首先這要追溯到濱口重國在一九三〇年發表的〈從府兵制到新兵制〉的大作，^{〔三〕}具體描述了府兵制破壞後一些新兵制的出現過程。濱口的研究筆路藍縷，難免有些粗糙；但他的研究指明一個方向，即把探究唐代從府兵制破壞後所發生的兵制變化作為研究重點。^{〔四〕}後來的日本學者如玉井是博、日野開三郎、菊池英夫等人都只是局部糾正、完善、補充濱口的觀點，或者進一步深入討論濱口的論文所提出的問題。^{〔五〕}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由於對敦煌吐魯番文書資料的深入發掘以及研究工作的細密，中國學術界

逐步擺脫了以府兵制代替唐代前期兵制的傾向。對於府兵制之外的兵種諸如兵募、團結、健兒、防丁等問題都有比較深入的討論。根據這些研究成果，雖然我們還無法完全恢復被歐陽修《新唐書·兵志》所略去的許多制度史內容，但是在兵役與兵員結構上，卻可以重建起比較清晰和完整的認識了。

本文的任務不是要復原唐代兵制的全部具體內容，而是試圖揭示圍繞唐代兵役和兵員結

〔一〕唐長孺：《唐書兵志箋證》，北京：科學出版社，一九五五年。

〔二〕陳寅恪：《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第六章《兵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七年；岑仲勉：《府兵制度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七年；谷霽光：《府兵制度考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七八年。

〔三〕濱口重國：〈府兵制より新兵制へ〉，載日本《史學雜誌》第四十一卷第十一、十二期，收入《秦漢隋唐史の研究》（上卷），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一九六六年。

〔四〕日本學者關於府兵制的研究，除菊池英夫外，還有氣質澤保規的《府兵制の研究》，東京：同朋舍，一九九九年。關於該書的評介見張國剛書評，刊《唐研究》第六卷，北京大學出版社，二〇〇〇年，頁四八一—四八八。

〔五〕玉井是博：〈唐代防丁考〉，收入《支那社會經濟史研究》，東京：岩波書店，一九四二年；日野開三郎：〈大唐府兵制時代の團結兵に就いて〉，收入《日野開三郎東洋史學論集》第一卷《唐代藩鎮の支配体制》，東京：三一書房，一九八〇年；菊池英夫：《唐代兵募の性格と名称とについて》，《史淵》六七、六八，一九五六年；〈節度使制確立以前における「軍」制度の展開〉（續編），載《東洋學報》第四十四卷第二期，一九六一年；〈節度使制確立以前における「軍」制度の展開〉（續編），載《東洋學報》第四十五卷第一期，一九六二年。

構所發生的重要變化，進而探討其制度特徵和社會意義，為中古社會歷史變遷的研究提供一個新的觀察角度。

一、兵員結構的變化

唐代兵役制度的重要變化概括在三個方面。首先，是關於唐代兵員結構的演變。學術界迄今對於唐代前期府兵制度之外的兵員結構有了比《新唐書·兵志》更全面的瞭解。唐代前期的兵員有：府兵、兵募、健兒、團結兵、防丁；後期的兵員則為：官健、團結（團練）。中國和日本的學者在兵員身份的認定上有較為一致的認識。目前存在的疑問是：唐代前期的兵員如此複雜，後期卻相對簡單，其間承繼關係應如何理解？而且，唐代前期有些兵員名目在《兵志》等史籍中沒有清楚的記載，是否有其制度上的特殊原因？總之，必須對於唐代前期的兵員名目作更深入的分析，才能對唐代前後期兵員的演變作出正確的理解。

足以引起我們疑問的還有這樣一段材料：《資治通鑑》唐紀玄宗天寶元年（七四二）正月條：「凡鎮兵四十九萬人。」司馬光於其下作「考異」曰：「此兵數，《唐曆》所載也。《舊紀》：

『天下健兒、團結、曠騎等總五十七萬四千七百三十二人。』此蓋止言邊兵，彼併京畿諸州曠騎數之耳。」^{〔一〕}這條材料對於理解唐代前期的兵員結構具有重要意義。它不僅記錄了開元、天寶之際全國現役軍人的總數，而且指明了當時的兵員種類。也就是說，唐朝中央軍事主管部門——兵部在統計全國在籍軍隊的時候，把什麼府兵、兵募、健兒、團結、曠騎等等的類，統統歸併為健兒、團結、曠騎三種。曠騎是開元十一年（七二三）用來取代府兵宿衛的禁軍，其來源是府兵與白丁。司馬光「考異」的意思是說，五十七萬多軍隊中除了曠騎（約八萬多人）外，正好是邊兵四十九萬人。而邊兵則只分為健兒和團結兩種。^{〔二〕}

關於團結兵，日野開三郎、方積六與筆者都有過論述。^{〔三〕}日野和方先生的文章只涉及

〔一〕《資治通鑑》卷二一五，北京：中華書局，一九五六年，頁六八五一。

〔二〕或謂團結兵剛建立時為地方武裝，此後性質有所變化，但這種看法沒有堅實的根據。我不認為玄宗天寶時期兵部對於邊兵的分類統計與武則天時期的情況有很大不同。武則天時期設置團結兵，屬於兵募性質的兵員。兵募本來就可以到邊疆去打仗，也可以在一些特定的防區戍守。唐前期團結兵材料主要見《唐六典》卷五，該書編纂於開元末年，與《資治通鑑》所記天寶元年邊兵分類統計僅相隔數年。

〔三〕參見日野開三郎：《唐府兵制時代の團結兵に就いて》，《大府兵制時代に於ける團結兵の稱呼とその普及地域》，收入《日野開三郎東洋史學論集》第一卷《唐代藩鎮の支配体制》；方積六：《關於唐代團結兵的探討》，《文史》第二十五輯，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張國剛：《唐代團結兵問題辨析》，《歷史研究》一九九六年第四期。